

战争语境下穆旦诗歌中的春景体验

邬若兰^{1*}

(¹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抗战初期随校南迁的经历, 是穆旦诗歌创作的重要起点, 春景则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自然意象。不同于传统山水诗的闲情书写, 穆旦笔下的春景是战争流亡语境下的特殊精神产物: 它既是乱世中暂时安顿内心的精神慰藉, 也是青春生命力与惶惑感交织的自我投射, 更暗含着从个体生机向民族新生延伸的朦胧想象。这份春景体验不仅承载了个体与时代的双重情绪, 更埋下了穆旦整个战争诗学的核心线索, 是理解其后续旷野书写、森林书写的精神原点。

关键词: 战争语境; 春景体验; 民族国家; 个体精神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1i6.1633>

Spring Landscape Experience in *Mu Dan's* Poetry in the Wartime Context

Wu Ruolan^{1*}

(¹ Guangzhou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Mu Dan's* southward migration with his universit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marked a pivotal starting point for his poetic creation, and spring landscapes stand as a core natural motif in his works from this period. In contrast to the leisurely, carefree scenery depiction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andscape poetry, the spring scenes in *Mu Dan's* writing are a distinct spiritual product shaped by wartime displacement. They offer temporary spiritual solace to steady the mind amid the upheaval of a chaotic era, serve as a form of self—projection interwoven with youthful vitality and profound bewilderment, and carry an implicit, tentative vision that stretches from individual vitality to national renewal. This spring landscape experience not only bears the dual weight of individual sentiment and the collective mood of the times, but also lays the foundational thread running through *Mu Dan's* entire wartime poetics, standing as the spiritual wellspring for understanding his subsequent writings on wilderness and forest imagery.

Keywords: Wartime Context; Spring Landscape Experience; Nation—State; Individual Spirit

引言

自然风景在文学作品中能起到渲染氛围、烘托人物、表达情感、推动情节发展等作用, 所以, 描绘自然风景就成为文学家们常用的一种写作策略, 当我们在对文学作家作品进行研究时, 其中

作者简介: 邬若兰 (2002-), 女, 湖南怀化,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中国古代文学

通讯作者: 邬若兰, 通讯邮箱: 2448753958@qq.com

www.shiharr.com

- 20 -

所提及到的自然风景具有的重要性是无法被忽视的。

在我国,文学作品中书写自然风景的历史悠久且丰富多彩。早在先秦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已经出现了对自然风景的细腻描绘和深情寄托,如《楚辞》中描述洞庭湖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其展现的洞庭湖秋景不仅为人物活动提供了生动的背景,更成为了人物内心情感的重要反映媒介。老子在他的哲学理论中,将自然山水视为“道”的载体,从而提出“道法自然”说,自然已经从单纯的物质性存在变为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载体,随后,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说也强调天人融合于自然、物我合一,自然也即“道”,于是自然风景成为了一种具有想象性的,融合了个人经验、艺术审美、社会历史的精神性构想,并直接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建构。此后,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将自然风景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来进行书写。以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为代表,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等一大批诗人都曾经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与自然风景有关的诗歌。在他们的作品中,自然风景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精神寄托和情感表达的载体^[1]。

“多重视角的研究使沉默的风景意象发出声音,使隐藏在关于风景及风景意象的知识和体验之后的社会性基础显现出来”^[2]。近代以来,对自然风景的书写往往融入了作家所构建的对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认同,即对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究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还是历史文化共同体这一问题的认识,以及对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的看法。由此,作品中的自然风景便具有了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

穆旦是一个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诗人,从抗战初期的随校迁徙到赴缅从军亲历战争,穆旦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有关战争的经历所带来的独特体验中有所感发而作的。

抗战初期,为了保持教育不被中断,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被迫南迁,因为战争,这些城市的学生们被迫离开了自己所熟悉的北方城市,他们徒步绕过了大半个中国,最终来到了祖国的西南边地——云南昆明,并在这里成立了西南联大。穆旦正是其中的一员,这“三千里步行”将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怀抱,让他有机会离开熟悉的“平原文明”,而来到了相对陌生的“山地文明”^[3]。在南迁的过程中,穆旦见到了很多在此之前未曾领略过的中国河山风光,也体验到了与北方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于是,在他的一些作品中都对这一迁徙过程进行了回忆和记录。在迁徙途中,穆旦创作的诗歌里出现了大量与“春”有关的意象,这些意象一方面是穆旦对其在迁徙过程中亲眼所见的春天景物的描绘再现,另一方面,这些充满生机的、明媚的“春景”意象又恰恰是穆旦在离开城市而置身自然山水之中后那种心灵自由的投射,因此,对“春景”的体验也成为了这一时期穆旦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春景的内涵随着诗人的行旅与思考不断延展,既承载着个体的青春情绪与流亡体验,也暗含着对民族命运的初步思考。

1 流亡途中的风景:作为精神慰藉的自然春景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站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在抗日战争背景下进行的迁徙活动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引发创作转变的契机。穆旦就是这样一位有着丰富的情感表现能力的诗人,其诗歌中的“自然风景书写”最初所表现的就是在战争背景下参加随校南迁活动的过程中自己对自然万物的切身体验,春天的景象、物象在穆旦的诗歌中呈现出其本真的面貌,将读者的思绪带入到春天的氛围中去。

在穆旦的笔下,春的气息和魅力,无不散发着这个季节独特的诗意体验。以《我看》^[4]为例,诗歌的前两节,诗人就真实地向我们描绘了他所看到的画面:“揉过”青草的春风、“低首又低首”的青草、平展羽翼的飞鸟、深远的晴空、红晕的流云和沉醉的大地……一幅晚春夕阳下的大自然美景图就这样生动自然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首诗歌中,“春风”和“青草”、“飞鸟”和“晴空”、“流云”和“大地”三组自然意象在诗人的笔下实现了艺术上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互相依存的包容和眷顾感。同时,通过这些互相联系的自然风景意象,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体会到,

在诗人的眼中,这些充满春天气息的自然风景并非是静止的,其中还蕴含着丰富活泼的生命活力。在这首诗歌中,“春风”和“飞鸟”都是活动着的,“青草”在春风温柔多情的“揉”中反复低首,“流云”悄悄变得“红晕”,“大地”则是变得“沉醉”。更值得注意的是,穆旦对自然风景的书写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对风景的粗略印象之中,而是更深一步地将自己的整个身心投入到自然之中,来与自然进行交流,从而让自己能够在景物变化中体验时间的流逝,在明媚的风光中感受生命的活力和躁动。诗歌的后半部分中,大自然的许多典型事物作为自然意象而集中地出现,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和谐的联系。将“风”“鸟”“云”“树”“花”等众多的自然意象组合在一起,与前两节形成了照应,于是全诗的印象得以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幅傍晚风吹草低、远水漾波、鸟飞霞红的春景图,带给诗人生生不息的生命体验,他的生命热情也被这自然活力点燃,最后不禁发出了“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这一希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感叹和宣言。

同样,在穆旦的《园》中,也为我们铺陈了一幅生机盎然而又活泼灵动的自然风景图:从泥土到树丛的嫩枝,再到天穹和石墙,还有白色的卷云和鸣啭着的燕子……一切的景物都充满了向上的生命力。诗人由远及近、自上而下地把这些意象推到读者面前,扑面而来的清新感不觉让人眼前一亮。虽然这首诗歌的创作时间是在1938年的8月,诗歌主要描写和渲染的也是在小城中的宁静生活,但诗歌中这些充满活力与生机的景物意象依旧充满了“春”的气息,尤其是在诗歌的第一节中,诗人对“温馨的泥土”自然是充满留恋与不舍的,而那沐浴在流转阳光中的高举着嫩枝的树丛,则更像是一股新生的力量,第四节中看到和听到的“燕子”也引起了作者的共鸣,“燕子”的意象在文学传统中向来被视为青春和活力的代表,具有清新之意,正是因为见到了这一系列明媚的、充盈着生机和活力的景物,诗人才会受到感召,在诗歌的最后一节中,诗人才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了“青草样的忧郁”,来迎接“红花样的青春”。

2 青春的焦灼:春景中的生命张力

如果说《我看》与《园》里的春景更多是外部风景对内心的抚慰,那么《春》^[4]这首诗,则将春景拉向了人的内部,让春日的生机与青春的欲望、惶惑纠缠在一起,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复杂面貌,它彻底跳出了传统写景诗的柔和框架,让自然成为承载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载体。

开篇一句“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一下子打破了人们对春草的惯常印象。以火焰喻春草,不只是形态上的相似,更在精神气质上形成了呼应:春草破土而出的势头,带着一种近乎野性的力量,它不是温驯的生长,而是带着灼烧感的扩张。这股“绿色的火焰”里,有蓬勃的生命力,也有令人不安的压迫感;它既代表着生命最原始的冲动,也暗含着无法掌控的破坏力。穆旦没有把春天写成温和的、治愈的,而是写出了它内在的烈性:万物复苏的背后,是欲望的苏醒与冲撞。

紧随其后的“花朵伸出来”,同样是极具动感的表达。花朵不再是静静绽放的审美对象,而是主动挣脱土地的束缚,带着“强悍”的质感,有自己的烦恼与欢乐。穆旦赞美那些勇敢追寻独立和自由的生命体,赞美那些在情欲之火中挣扎、成长、绽放的花朵。这些花朵和草地共同构成了春天的生命力,也象征着人类生命中的激情、冲动和成长^[5]。穆旦将这些春日的生命,与“二十岁的肉体”并置,让自然的生机与青春的身体形成了互文。二十岁的年纪,本就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阶段,而战争的到来又将所有的青春规划都打乱了,旧的价值体系已经破碎,新的人生方向尚未清晰,满溢的生命力找不到出口,便只能在身体里冲撞、燃烧。所以诗里才会写“我们被点燃,我们却无处归依”,生命的欲望越强烈,找不到归宿的惶惑就越沉重。

这里的“欲望”不能做狭义的理解,它不只是青春的情欲,更是更广义的生命扩张欲,年轻人渴望突破现状,渴望抓住某种确定的意义,渴望在混乱的时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春天恰好放大了这份渴望,也放大了渴望落空的焦灼。满园的春色越是美丽,越衬出内心的无措;生命的力量越是充沛,越显出方向的缺失。穆旦笔下的春,就是这样一种矛盾的混合体:它一边催生希望,一边制造迷茫;一边让人感受到生命的鲜活,一边让人直面存在的困惑。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里，春景要么是和谐恬淡的意境载体，要么是伤春悲秋的情绪依托，始终逃不出“情景交融”的柔和框架。但穆旦笔下的春，不再是平衡的、圆满的，而是分裂的、冲突的。它既有让人沉醉的生机，也有让人焦灼的欲望；既有对新生的渴望，也有对未知的迷茫。这种矛盾性，恰恰是战争年代年轻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穆旦写春天，本质上是在写战争语境下的自己，写一代年轻人在青春与时代碰撞时的复杂心境。这份不回避冲突、不掩饰困惑的书写，让他的春景体验脱离了传统写景的套路，具备了真正的现代品格。

3 时代的倒影：春景中的民族新生想象

穆旦曾经在评价诗人艾青时说：“作为一个土地的爱好者……没有一个新诗人比艾青更‘中国的’了”^[4]“我们可以想见许许多多疲弱的、病态的土地都随着抗战的到来而蓬勃起来了，它们正怎样拥挤着在诗人的头脑里，振奋他，推动他，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粗大的线条把它们表现出来。”^[6]穆旦对艾青的评价也蕴含了其本人对祖国的爱和期望。随着南迁行程的推进，穆旦的脚步踏过了更广阔的山河，春景的内涵也延伸向了更辽阔的原野与江河，开始与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产生关联，个体的青春体验，慢慢与民族的时代情绪发生了汇合。

在《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4]里，诗人开篇便写下“澄碧的沅江”“浓密的桐树、马尾松”，将西南丘陵地带的春日风光直接铺展开来，并将“风景”和“祖国的心脏”紧扣在一起，通过细腻的描绘和深情的抒发，把它们变成了“祖国”的形象化表征^[7]。当诗人行走在土地上，眼中的春日江水与山峦，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自然景物，而天然地带上了“祖国”的质感。他写江水“割进幽暗的夜”，像“一条抖动的银链”，字句里藏着一种带着痛感的深情，这片山河正在经历战火，可它本身的壮美与坚韧，依然能给人以力量。

到了《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4]，这种感受变得更加明确。诗人写自己“离开了渔网似的城市”“在浓郁的绿海上浮游”，字里行间都是挣脱束缚的自由感。这里的“绿海”，是春日里漫无边际的原野，也是摆脱了城市压抑后的精神空间。而这份自由感，又不只是个人的释放。当诗人走在先祖也曾走过的土地上，看着亘古不变的原野在春日里焕发生机，他很自然地会将自然的生命力与民族的生命力联系在一起。战争带来了破坏与流离，可只要这片土地还在生长，只要这里的人民还在前行，这个民族就不会倒下。春日原野上的生机，就这样悄悄转化成了对民族新生的期许。

当然，这种期许还不是后来《赞美》里那种以“旷野”面貌出现的明确、厚重的民族宣言^[8]，它更像是一种朦胧的、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信念。穆旦没有直白地喊出救亡的口号，而是将这份情绪藏在了对春日原野的书写里，个人的青春热情，与对民族未来的期盼，在辽阔的春景里完成了第一次汇合。他不是先有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再去写景，而是在行走的过程中，在与大地的贴身接触里，慢慢生出了与这片土地共命运的情感。

从园中之春到开阔的原野之春，穆旦笔下的春景完成了一次空间与内涵的双重拓展，这个过程本质上也是诗人自我认知的拓展，他从一个关注内心的青年学生，慢慢成长为一个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绑定在一起的时代青年。

4 春景作为起点：穆旦战争诗学的雏形

穆旦早期诗歌的春景体验里已经埋下了其整个战争诗学的种子，是他所有后续书写的精神起点。不理解这份春景体验，就很难真正理解他后来更为厚重的自然书写。

穆旦的春景书写从个人的情绪出发，慢慢走向了对民族土地的认同，这条线索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旷野书写里不断放大，最终凝结成“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强音^[9]，最能体现穆旦“旷野体验”催生的强烈民族精神的作品无疑是这首“伴随着深沉的痛苦”的“带血的歌”——《赞美》^[4]。祖国的土地上，连绵着走不尽的起伏的山峦，孕育着丰富的河流和草原，这里还有数不尽的村庄，

村庄里密密的鸡鸣和狗吠此起彼伏,旷野见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文明,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民辛勤劳作和繁衍的故事。诗人就像一位行走在大地上的旅行者,土地和村庄是他旅行所体验到的场景,同时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国家的象征。接下来,诗人通过亘古就有的风、流水和森林展示了时间的长远和历史的悠久。这风是“呼啸着干燥的”,这水是唱着“单调的”歌声的——而且是“在低压的暗云下”的,这森林是“忧郁的”,这些带有作者鲜明的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共同酝酿出了一种悲凉的气氛。同样,在这旷野上,生长着的是中国农民世代荒凉的生活,“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人民的生活是艰辛和沉重的,但他们并未放弃与自然和命运进行抗争。“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虽然命运是沉重痛苦的,但他们仍旧具有一种坚韧的力量,期待着泉涌的热泪,期待着未来的希望。在这贫穷与荒凉里生活着的,是“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世世代代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长河中的人民,但是,他们并没有被苦难压垮,也从未失去在黑暗中“孕育难产的圣洁的情感”(《活下去》)的民族精神,他们始终勇敢地地在“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五月》)抗争着“活下去”(《活下去》)。正是在这些以旷野为家的“粗野”之人的世界里,穆旦发现了民族觉醒的事实,并发出了那冲破历史夜空的“新的抒情”,告诉深陷战争摧残的国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可以说,南迁路上的春日原野,是穆旦“土地—民族”认知的最初载体,没有这段行走与观察的经历,后来的旷野书写便不会有那样扎实的情感根基。他对民族精神的书写,从来不是空泛的概念演绎,而是从脚下的土地、眼前的风景里一点点生长出来的。

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自然观点,自然界是一个独立于人类意识的客观存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始无终的,表现为一种永恒发展的状态^[10]。在春景书写里,穆旦已经开始探索人与自然的联结方式,从最初的寻求慰藉、渴望合流,到后来感知到自然野性的力量,再到在自然中确认自身的生命位置。这种思考并没有停留在“天人合一”的传统框架里,而是带着现代人的感知方式,承认自然的独立性与力量感。

春景中所具有的“绿色”的生命力量,是贯穿穆旦战争书写的一个重要意象线索。《春》中提到的“绿色的火焰”,展示了春日草木蓬勃的生机自带的原生野性与冲击力,到了《赞美》中,这份绿色的生命力延展为辽阔的大地与草原,成为承载民族苦难与韧性的基底。而到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4],同属绿色谱系的原始密林,却将自然生命的力量转向了反面:遮天蔽日的绿色不再滋养生命,反而化为“绿色的毒”,成为吞噬士兵生命的异己力量^[11]。穆旦将森林作为主要的书写对象,极力渲染其所具有的神秘性、非文明性,向读者展示森林中所蕴含着的令人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力量。与“曾经迷误在自然底梦中”而感到“我底身体由白云和花草做成”的“我”的感受不同,这里的森林带给人的已经不再是拥抱和抚摸,而是展现出了其原始、野性和可能带有威胁性的一面,呈现出狰狞的面孔:绿色肥大的叶子遮住了阳光,为各种爬虫、疾病等提供了栖息的场地,当人类走进这片死亡森林,立刻便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在《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中,穆旦对原始森林给他带来的恐怖体验直接有以下描述:“像多智的灵魂,使我渐渐明白,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在这里,原始森林所象征的自然具有掌控一切的神力,而这种力量又可以令人“畏惧”“窒息”“血肉脱尽”,在神秘的自然面前,穆旦和他的队友们经受了炼狱般的考验,体验到的是惊恐和绝望。

在这场人与森林之间的搏斗中,人们的命运甚至要依靠森林来把握和决定。诗作第五节以森林独白强化其主宰地位,“这不过是我,设法朝你走近”“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借抽象象征凸显自然重塑生命的压倒性力量;“无言的牙齿”与开篇“我笑而无声”形成呼应,森林的冷峻、诡异与严酷在这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空幻的血液里的纷争”不止于人与自然的对抗,更指向人类社会的侵略战争、种族屠戮等非理性争端。尽管胡康河谷埋葬了无数先驱的尸骨,

绝境中的将士却未曾屈服,他们以血肉为同伴开路,在死亡围困中相互扶持,以自我牺牲换取群体存续,终使逝去的生命“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在林野中获得精神延续。诗篇以极富音乐美的祭歌作结,其中的“遗忘”二字可以看作本节的重点,它向我们揭示了在战争中无名无姓的战士们终将被遗忘的至理,这种体验对诗人来说是残酷的。最终诗人落笔重回“胡康河谷上的白骨”,这不仅是对战争中牺牲战士的沉痛缅怀,更是对生命、自然和人类价值意义的深刻反思,在诗人看来,他所要重点突出的不仅是战士死亡的意义和价值,还有自然(森林)的强大和人类的渺小,以及人类所信奉的价值意义存在的狭隘性:战争的拼杀等在人类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在自然的眼中却显得微不足道。森林不会因为人类的纷争而改变它的生长规律,也不会因为人类的死亡而停止它的脚步。无论是胜利还是死亡,无论那“白热的纷争”多么经久不衰,都被森林以其独有的方式“把一切遗忘”。

可以说,从春景里的“相融”到森林里的“对抗”,穆旦对人与自然的思考是一以贯之的,只是战争的极限体验将它推向了极端。

穆旦从一开始写春,还没有走传统山水诗的老路,他带着现代人的困惑与分裂感去看自然,让自然承载起复杂的现代情绪。这种感知方式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无论是旷野的悲壮还是森林的荒诞,本质上都是现代个体在特殊语境下与自然的对话。他不追求物我两忘的和谐境界,而是直面人与世界、个体与时代的紧张关系,这正是穆旦诗歌最核心的现代特质。而这份特质,在他最早的春景书写里就已经显露出来。

5 结语

穆旦笔下的春景,是生机勃勃、明媚动人的。万物复苏,绿意盎然,每一处都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这“春景体验”一方面是他所看见的一系列万物生长的明媚的自然春景带给他的实在感受,另一方面,这样的“春景”又与其青春的生命产生了精神上的关联,充满了青春旺盛期的荷尔蒙气息:明媚、躁动、饥渴、燃烧、毁灭层出不穷。穆旦的“春景体验”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对青春生命力的赞美上,因为对自由和未来的追寻,“春景体验”同时又充满了理性、幻灭、惶恐、怀疑与不确定性,在对自身力量的肯定中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来自历史和现实环境的空虚、茫然、绝望感。然而,穆旦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他热爱自然、热爱生命,更热烈地爱着祖国。他的诗歌中的“春景体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体验的一个投影,更是他作为一个渴望创造新秩序、渴望与时代融为一体的年轻人的号角和宣言。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诗歌,传达出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对自由与未来的追求与向往。

参考文献:

- [1] 程振兰. 古典性与现代性: 论穆旦诗歌中自然风景体验[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4-5.
- [2] [英]达比. 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 [3] 程振兰. 从自然风景体验看穆旦诗歌的现代性[J].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2015(03): 88.
- [4] 穆旦. 穆旦诗文集(1)[M]. 增订版.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 [5] 叶琼琼. 从“春”的隐喻内涵看穆旦诗歌的传统性与现代性[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5(2): 90-100+196.
- [6] 易彬. 赞美: 在命运和历史的慨叹中——论穆旦写作(1938—1941)的一个侧面[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05): 254-271.
- [7] 段从学. “三千里步行”与穆旦的“转变”[J]. 北方论丛, 2016(05): 37-42.
- [8] 黄开发. 带泥土气息的赞歌——穆旦《赞美》读解[J]. 名作欣赏, 2020(09): 84-88.
- [9] 马绍玺. 边地风景体验与西南联大诗歌[J]. 文学评论, 2015(01): 88-98.

[10] [苏]罗森塔尔,尤金. 简明哲学辞典[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3.

[11] 洪思慧. 穆旦诗歌的战争记忆与生命意识[J]. 品位经典, 2021(01): 4-6.